

民

国

沧军
桑旅

黄亦兵著



人

物

孙立人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大

系

K825.2
223

95869

军旅沧桑——

孙立人

黄亦兵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DK84/36
02

军旅沧桑

——孙立人

黄亦兵 著

于泽俊 策划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216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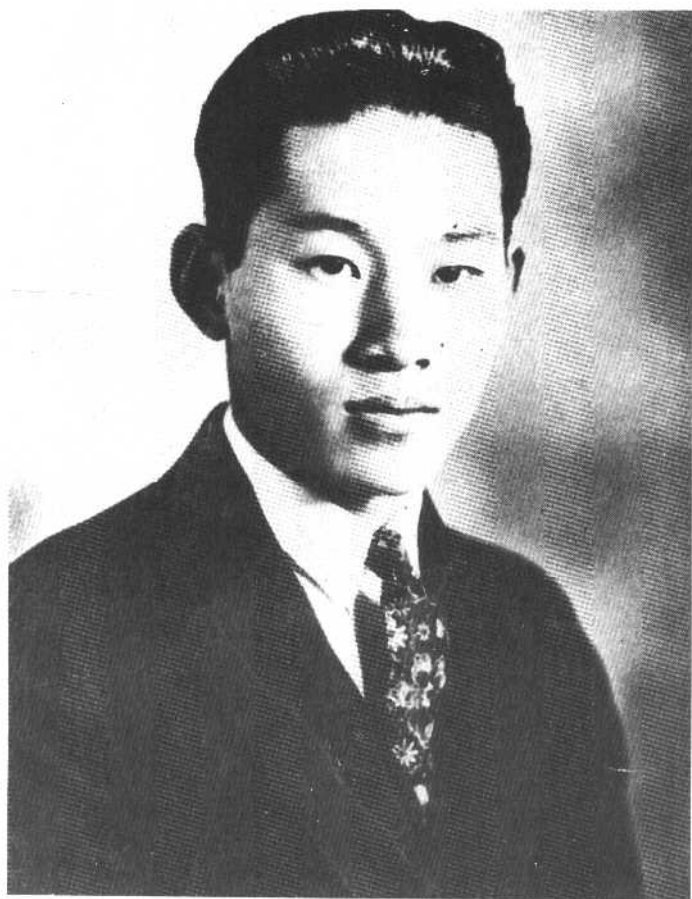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125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9千字 印数:1—15000册

ISBN7-311-00956-1/K·107 定价:10.50元



目 录

第一章 投身军旅	(1)
家世与学生时代.....	(1)
回国从军与海州练兵	(11)
抗日战场初露锋芒	(23)
第二章 赴缅抗战	(38)
重建税警总团	(38)
新三十八师赴缅抗敌	(45)
缅甸战况与仁安羌大捷	(53)
掩护撤退与退往印度	(70)
第三章 反攻缅甸	(85)
印度整训	(85)
血战胡冈谷地	(99)
奇取加迈、莫冈、密支那.....	(115)
继续南下.....	(129)
第四章 从东北到台湾	(145)
东北内战.....	(145)
登上台湾岛.....	(160)
潜伏的危机.....	(175)
第五章 蒙冤与平反	(186)
蒙冤辞职.....	(186)

幽居生活.....	(201)
冤案平反.....	(208)
后 记.....	(224)

第一章 投身军旅

家世与学生时代

孙立人，字仲能，1900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书香之家。^[1]

有关孙立人家世方面的资料寥寥无几。他祖父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他的父亲孙熙泽，字焕庭，生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举人出身，当过教书先生，在山东登州府做过官；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省督察署署长、五省烟酒专卖局局长等职，1932年辞世。他的伯父孙恂泽，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曾为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随刘治理台湾，任职基隆海关。孙立人兄弟三人，兄孙同人，字伯亨，先后任过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秘书、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务组长，解放前死于日本；弟孙衡人，字叔平，一生大半时间操持家务，解放后在蚌埠去世。

旧时，书香门第与官宦之家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孙氏家族亦是如此。孙熙泽自幼由兄长教导读书，受到中国传统的伦理与知识教育，注重考取功名。到孙立人启蒙时，孙熙泽请了个叫宋执中的老先生到家里办私塾，希望他严厉地管教自己的孩子。孙立人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我和弟弟启蒙开学的那一天，我的父亲亲自捧一方戒尺，

很尊敬的送给先生，意思就是说，我把孩子交给先生，请求先生严格管教。那种严肃的场面，使得我和我弟弟面面相觑，各捏一把冷汗。后来果然我弟弟背不出书，被先生打得头破血流，血溅挂图上面。后来先生也觉得过意不去，未免处罚过火。但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去安慰先生，并说先生打得对，严师才能出高徒，他表示非常感谢先生。^[2]

孙熙泽是个典型的旧学之士，不仅相信体罚的威力，而且沿袭自己受教育时的方法，除了让孩子死记硬背、一心读书外，不许他们到户外玩耍。七八岁的活泼儿童，被紧紧关在书房之中，面对一大堆线装旧书，摇头晃脑，念念有词，煞是可怜。此时，孙家已迁到庐江县金牛山，房子有好几重，其中最后一重，便是孙熙泽让孩子们读书的地方。白天，除了吃饭时能和家人见面外，其他时间一律都要在书房中，就是晚上也要睡在里面。孙立人生性好动，这样的日子使他感到“等于坐牢一样”。^[3]

孙立人启蒙受业之时，中国的科举制度已告结束。但当时新式学堂很少，除了较大城市有一些外，广大乡村仍是象宋执中那样的老头子在传道授业，讲的无外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好在科举已废，不用再习八股文。

1909年（清宣统元年），孙立人随父亲来到山东济南。当时，孙熙泽正在登州府做官。孙立人便随兄长和舅舅留在济南读书。辛亥革命时，孙熙泽辞官不做，闲居青岛。孙立人在青岛上了高等小学。不久，全家搬到北京。初到时，没有适合的学校进，孙立人只得在家念书，请先生教国文、英文、算学等。

1914年，清华学校招生。孙立人的一个同乡正在清华上学，向他介绍学校的种种情况，引起孙立人的兴趣。

清华学校是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指定用于教育事业而创办的。校址选在北京西北郊风景秀丽的清华园，故名清华学校。它实际是所留美预备学校，分中等、高

等两科（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正课教学全部用英语。每年招生的名额，按各省分提庚子赔款数额的比例分配。考生要按籍贯回本省应试。

这一年，分配给安徽的名额是5名。孙立人与弟弟孙衡人回到安徽省会安庆应试。结果，孙立人考上正取第一名，孙衡人考上备取第一名（正取5名，备取5名）。经复试，孙立人幸运地考上清华。从此，与清华结下了长久的缘分（他的四个孩子，三个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

清华学校在当时尚不大引人注意，一是建立时间不长；二是在这个学校苦读8年之后，还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求学，被大多数人视为畏途。

孙立人选择清华，可能是出于年轻人的冲动与好奇。而孙熙泽同意他去，对于一个晚清举人、旧学之士来说，倒有点出人意外。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如果说孙熙泽从前表现得极为正统、严厉的话，在对孙立人上清华一事上，则表现得极为开明与宽容。当然，严格管教的那一套，他还是念念不忘。孙立人考取后，他带着孙立人去见清华校长周治春，几乎重复了孙立人启蒙时他对宋执中说的那些话。孙立人后来回忆道：

他带我去见周校长，见到周校长，就先做了个揖，跟周校长说：“请你把我这个小孩子就当作你的小孩子，有什么事情，就打，打死了我也不心疼。”^[4]

1914年8月末，北京初秋的天气，孙立人带着铺盖到清华报到，开始他在清华校园的生活，这一呆就是9年。

孙熙泽带着儿子去见周治春校长，要他严格管教。周校长满口答应。其实用不着他亲自出马，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在清华以严格管理闻名。陈是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孙立人称其是“陈胖子”，并对他印象极为深刻：

陈先生，我们只知道怕他，因为他严，所以当时对他不

大好，现在事后感觉到了。那时要是有什么，有的就叫人思过——星期日人家都去玩了，他专有一间像现在的警卫室一样，叫你思过；所谓思过者，叫你念论语、四书某一段，还要背，都是这样。我们当时感到很愉快，可是事后很感激他。^[5]

进四壁挂满格言的“思过屋”思过，是清华当年诸多处罚措施中最轻的处分。即使如此，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纪录，休想再获得品行优良奖。而且，思过要牌示，即把你的错误及处分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楼道中。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要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一向品行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没有材料记载孙立人受过处分，不过种种严格的生活管理，对他以后从事军人职业，无疑是有裨益的。离开清华后，他不但非常感激“陈胖子”，也非常感激“主张绝对严格”的周校长。抗日战争时，孙立人在桂林遇到周治春，感到“比父子见面还来得亲切，因为那时回想起来，他对我的爱护是真正出自至诚”。^[6]

清华的学习生活尽管很严格，但孙立人仍觉得“一进清华，另开天地，好像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7]

这一方面是由于清华的课程设置与众不同，上午是主课，如英文、作文、公民、数学、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物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且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是副课，如国文、修身、哲学史、文学史、伦理学、修辞等，则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上午的主课，非认真充分准备不可，否则上课时无从应付；下午的副课则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这种教学方式使孙立人感到新奇不已。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特别重视体育。

比孙立人晚一年入清华的著名作家梁实秋，在他的《清华八年》中，有关于清华注重体育的描述：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一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济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浑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8]

这种读书与运动的结合，与孙立人幼时闭门深读的私塾教育相比较，简直是两个世界。孙立人对运动有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基础，可并不妨碍他“一下课，一摇铃，就出来蹦蹦跳跳玩了”。除了上课、自修，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操场上，以至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一次玩翘翘板时磕破了输尿管，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这次事故估计发生在他进入清华不久的时候，因为以后，他成为清华著名的运动健将，而且年龄渐长，该不会再玩翘翘板那样的儿童娱乐器具了。孙立人受伤的时候，正是寒假以前要考试的时候，为了不耽误考试，他只做了些简单的治疗，未等痊愈，便赶回学校。结果，考了一半，坚持不下去了，只得又回到协和医院。本应该1922年毕业的孙立人，休学一年，直到1923年才毕业。这就是他上了9年清华的原因。

病愈后，孙立人对运动的兴趣更加高涨，好像什么地方不如人都不行，星期六的下午和整个星期日，他几乎都是在操场上度过的。除田径外，当时能见到的球类项目如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手球、棒球等，没有他不玩的。在诸多球类项目中，他最喜欢足球。中等科三年级时，他被选到了校队。然而使他在学校闻名的，是他在高等科时开始练习的篮球。他练篮球后进步飞速，再次入选校队。清华重视体育，学生们普遍爱好运动，其中的佼佼者，不但在同学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生活上也得到学

校的特殊照顾。这时，已与孙立人同届的梁实秋回忆道：

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做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9]

“侧目”归“侧目”，清华的运动队给学校带来的荣誉，确是大家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

清华学校篮球队在北方有几个对手，其中最主要的是北师大队。北师大因有体育系，所以体育方面人才济济。两校在篮球上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梁实秋回忆清华体育诸事，记忆最深刻的两场比赛，其中就有清华与北师大的篮球比赛：

清华的阵容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是孙立人、王国华……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10]

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由清华和北师大篮球队联合组成华北代表队，在国内预选赛上，分别战胜了华东、华西、华南、华中代表队，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的资格。孙立人是华北代表队的主力后卫。5月30日至6月4日，孙立人随中华篮球代表队参加了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比赛，结果先以32比29胜日本，再以30比27胜菲律宾，夺取冠军。

9年的清华生活，孙立人以运动闻名。他自己称当时的清华有三种人：好运动的是运动派；好读书的是老先生派；好游手好闲的是游手派。他便是运动派的代表人物。他前后期的同学，凡回忆到他的，莫不称赞他的运动才华。幼年时蓄积在体内未得到发挥的能量，好象必须得到发泄，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孙立人，凭着对体育浓厚的兴趣和坚持不懈的锻炼，以及不甘落后的进取心，成为优秀的运动健将。运动中坚韧、苦练、合作的原则，对他以

后的事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他对职业的选择。

1923年6月17日，孙立人与全体该年毕业的同学，身着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参加了隆重的毕业典礼。9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算是较长的岁月了。这9年教育的影响与作用，一直伴随着他，并使他的生命潜能真正获得理想的发挥，创造出不平凡的人生业绩。

拿着一纸文凭的孙立人，离开了清华园。想到不久便放洋海外，不知是高兴还是哀伤。

眼见儿子将负笈远游新大陆，是福是祸，孙熙泽的内心也十分不平静。他特与儿子合影留念，并题辞刻于墨砚上相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朱晦翁训弘为宽广，毅为强忍。汝性忠实，立志亦颇不随流俗；第规模狭隘，遇事非泄沓即急遽，皆才识不足之过，宜于宽广强忍下功夫。交友为品学成败大关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汝本中材，最易移染，慎之。远适异国，所为何事？望时时于此著想。慎寒暑，节饮食，惩忿窒欲为保身要诀。今当远离，特训教语，携置案头，朝夕省览，以当面命。^[11]

知子莫如父，寥寥数语，将孙立人性格之特点，修身之必须，养命之要诀，一一点出，训海之切，寄望之殷，淋漓尽致。

8月，孙立人携此家训，告别家人，到上海候船放洋。同届毕业的60多人，也都要赴美留学，其中，有后来成为他的副师长的齐学启将军。

清华学校毕业生赴美留学，享受官费。到美国后，孙立人进入印第安纳州普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这是孙熙泽为儿子选择的专业，孙立人自己更倾向于学习军事。为了不违背父亲的意愿，他遵从了父命。

孙立人要学军事，据他自己回忆，主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前后，他随家人避居青岛。青岛是座美丽且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

当时是德国人的领地。一天，他在海边捡到一颗很好看的石子，被在附近玩的两三个德国小孩抢去，并挨了两个耳光。这件事，他一直引以为耻，同时萌发了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中国人不受外国欺辱蹂躏的愿望。^[12]军人，可凭武力维护一个国家及它的人民的尊严，免受他人的欺辱，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无端被打之时，想到军人的形象，是很自然的。这可能是促使孙立人选择军人职业的诱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9年清华生活，作为“运动派”的他，已不习惯从事土木工程之类平淡、安稳的职业。激烈的拚争、对抗与冒险、刺激的气氛，平时良好的训练与战时战术的运用，实力的强弱与幸运之神的关照，这一切，除了运动，只有军人这个职业具有如此的特点与魅力。幼时蒙受耻辱的记忆，加上寻求壮伟生活的强烈愿望，终于促使孙立人选择了另一条路。

1924年夏，孙立人在普顿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转入维吉尼亚军校。

维吉尼亚军校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州立军校，创办于1839年，其历史仅次于西点军校（即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创建于1802年，校址设在纽约市的西点，West Point，故通常称为“西点军校”）。该校招生虽有年龄、体格、学历、成绩等方面的限制和要求，但不限制国籍。这对孙立人很重要，因为他当时已超过了入校年龄，而对外国人可适当照顾。此外，该校办学宗旨十分独特，它培养的是文武合一、品质优良的青年，并不以培养军官为第一任务。培养出来的青年未必选择军队作为终身的事业。学校一方面教授军事史、战术、技术、指挥统御、兵器等军事课程；一方面又颁授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一类的学士学位。对孙立人来说，这可以成为搪塞父亲改变专业的好借口。总之，孙熙泽对儿子转学之事没有表示什么反对意见。

维吉尼亚军校学生实行自治管理，高年级学生被赋予许多权

力，体罚和打骂新生也随之产生。在美国军校，特别是西点和维吉尼亚，体罚、打骂新生的行为并不被认为是完全荒唐的胡闹。这样做据说是为了使新学员学会自制和提高对痛苦的耐受力，而最重要的则是学会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军人职业的基础是纪律，而纪律的实质就是服从。对于具有独立意识和精神的人来说，“服从”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军人必须使自己养成服从的习惯，因为可能有那么一天，生和死以及战斗的胜负就取决于它。要服从合理的命令很容易做到，但只有平时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才能服从那些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命令。

有人曾提醒孙立人，维吉尼亚军校体罚和打骂新生是非常厉害的。但孙立人决心已下，心中默念着父亲“宜于宽广强忍下工夫”的训诲，毅然走进军校大门。

一进去，气氛果然不同。高年级学生叫新生为“老鼠”，有理无理一天三顿打，三天九顿骂。在当时美国人心中，中国人都是些生日时吃鸟巢——燕窝，平时抽鸦片的大烟鬼，而且不叫孙立人中国人而叫“支那人（Chinaman）”。这是令中国人感到羞辱的字眼。精神折磨可能是无意的，那肉体上的痛苦，却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老生可以随便打人，随便骂人，没有理由。而且还要和颜悦色、逆来顺受。……老生也可以叫新生到房间里做任何动作，如两腿半分弯，做各种姿势，他可以随便打，你不能动的，也绝对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大逆不道。^[13]

通常老生总是听到起床号音后才起床。新生则号音一落，便要排好队，假若有一天起床号还没有吹，老生便起了床，那就不得了，老鼠便要挨打。老生起床后，立刻布满上下楼梯口和新生必经的要路，新生跑出集合，经过每一个老生面前时，都要挨一拳。头一次我还不晓得厉害，第一拳、第二拳，

都挨过去，不料第三拳，对心打来，急而且猛，我立刻昏迷倒地。醒来后，爬起来再跑。前面的人并不因我已受伤，便罢手不打，依旧是照样挨揍，跑到队伍前迟了，又要被打。至今我的胃部下面常常发痛，还是那一拳的创伤。末后这种打法，是家常便饭，而且每礼拜必有一次。另外一天，有位老生叫我洗手套，我准时帮他洗好，并且必恭必敬的双手送上，满以为他总要说我几句好话，不想适得其反，那位老生悠闲的坐在屋里抽烟，把手套收下后，不声不响的顺手把截烟屁股按在我的颌下，要我将下颌猛收，烧得我皮肤灼痛，他一高兴，才叫我离开。这种恶作剧，可以说是毫无理由的磨难人。像上面的例子很多，有时叫人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但是我牢记着父亲叫我强忍两字的教训，和原为吃苦而来的初衷，我决心忍耐下去。^[14]

体罚、打骂新生，是维吉尼亚军校的“传统”。它的作用，积极与消极，无可厚非，但无毅力、耐心，是难以承受的。事实上，无论西点，还是维吉尼亚，新生的淘汰率是很高的，其中，能否承受这种粗暴无理的惩罚及侮辱的折磨，是新生能否进入高一年的必修课程之一。与孙立人同时，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进入维吉尼亚军校，有的无法忍受类似的折磨而退学。^[15]能坚持下来的，除了拥有为实现志愿而甘于牺牲一切的信念外，还需要有“忍辱负重”的体力与意志。孙立人不但通过了这一必修课程，而且，据他说改变了自己的火爆脾气，增强了经受挫折的信心和能力。

后来我渐渐了解这种训练，就是要养成军队里没有理由的自然服从的习惯。老生管理新生，便是资历服从的训练。这一年的老鼠生活，磨炼出我有忍耐一切艰难困苦的耐心，对于二十几年来的带兵作战，和做人办事，都有莫大的帮助。^[16]

在维吉尼亚军校的这段生活经历，令孙立人难忘。因为这里

培养了他成为一名合格军人所必备的诚实、坚忍、无畏、不屈不挠的品格和强壮的体魄。十几年后，当他率领新三十八师在缅甸茂密的丛林中同日军奋战时，中国人通过他了解到美国南方的那个军校。同时，61位毕业于维吉尼亚军校的美国将军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同孙立人并肩指挥战斗。其中包括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1901年毕业于维吉尼亚军校）和美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巴顿中将（1903年至1904年曾在维吉尼亚学习）。

孙立人也因为是这两名美国著名将领的校友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回国从军与海州练兵

1927年，孙立人留美学成回国，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准备出外谋职。他的理想职业当然是干军事。同那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他深受军国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想国家强盛，当然武力要强”，国际间只有武力强大的国家，才能不受人欺侮。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在广州誓师北伐。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响应。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2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陕、冀部分地区；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吴佩孚、张作霖相勾结，控制着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只有10余万人，国民军联军约5万人，兵力虽少，但是新锐之师，又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故而出师不过半年，国民革命军先在湘、鄂打败吴佩孚的主力，继在赣、闽击溃孙传芳，兵锋直指中原腹地和长江下游地